◆观　点

破解“分蛋糕”阶段性难题

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词，一个是国家治理，一个是现代化。这就要求我们把时间放在1978年以后，即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当中，来对这个问题进行考量、诠释和理解。1978年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主要是解决把“蛋糕做大”的问题，所以邓小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。从国际上讲，我想借用大卫·哈维的概念——时空压缩。国内的背景是初级阶段，国际的背景是时空压缩。这两个背景要求我们必须把蛋糕做大。把蛋糕做大，从民众角度来讲，就是聚精会神搞建设，一心一意谋发展，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涌流，让一切创新能力迸发；从社会角度来讲，就是让一切生产要素都充分释放能量且作出更大贡献；从国家角度来讲，威权体制要有效。这个体制如果决策正确，它可以集中力量和资源办大事，即把我们国家的力量、资源集中到解决主要矛盾、解决经济发展上来，专心把蛋糕做大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，我们的现代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这个阶段邓小平称之为“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”。现在是初步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，即蛋糕相对做大以后大家都想分蛋糕的阶段。用学理性的话来讲，就是进入了表达诉求、矛盾突发、攻坚克难的阶段。促进公平正义，增强人民福祉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。蛋糕做大以后大家都想分蛋糕，都想表达诉求，如参与诉求、权利诉求、民主诉求、公正诉求等。当前，民众表达诉求日趋增强，而且也越来越多样化。

诉求要得到满足需要两个条件，一是客观条件，二是主观条件。在客观条件方面，我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，在资源配置方面也不够合理。在主观条件方面，总体来讲，我们公民的文明素养还不算太高，比如不少人多讲民主而不讲法制，多讲自由而不想守纪律，多讲利益而不讲担当，多讲自主而不愿承担责任，多讲权利而不讲义务，多讲索取而不讲奉献，多关注利害而不关注是非，注重表达诉求而不大注重表达诉求是否合理、合法。这就进入了矛盾突发期。面对矛盾突发，有些人回避矛盾，掩盖矛盾，绕着矛盾走，结果我们的高楼大厦很高，我们的矛盾也堆成山。这就意味着要攻坚克难。

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问题主要有三个：改革、发展、稳定。改革、发展和稳定是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总问题、根本问题。这个总问题、根本问题在这个阶段显得更加突出了。发展与动力机制有关，稳定与平衡机制有关，改革说到底是一种调整机制。这三种机制是我国现代化进入这个阶段面临的总问题或根本机制。自行车没有动力，就跑不起来，它失去平衡就要倒下去，自行车既要跑得快，而且不倒下去，骑车人调控的技能是关键。一个社会没有动力，好比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，一个社会失去平衡，好比一匹脱缰的野马。我们既要有动力也要达到和谐，全面深化改革这个调整机制是关键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总目标，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就是来破解这些命运问题，就是要发挥好这三种机制。

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须现代化：一是由过去相对注重国家管制走向注重国家法治，注重法治及制度的力量；二是由过去相对注重国家的统治走向现代的共治体系，即国家的“政”治、社会的“自”治、公民的“能”治和“德”治有机结合；三是由国家的权力管制走向国家的能治，即靠能力来治理，过去我们主要是靠权力来管制，现在我们更要发挥政府及政府官员的能力，发挥能治的关键作用。（2014年7月上《人民论坛》韩庆祥）

激发社会活力是根本指向

十八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，从行政体制改革到财税体制改革不一而足。这一轮深化改革有一个突出特点，都是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的改革，大多是带有全局性的改革。而上一个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在微观层面的改革。从操作模式上来看，以往的改革主要通过试点的形式，而这一轮改革则更强调顶层设计。财税、国企、金融等改革领域，都需要国家的统筹安排。今年上半年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、李克强总理关于改革也有过多次讲话，党中央、国务院直接推动，这与以往的改革有很大区别。

要理解这一轮深化改革的逻辑，主要从三个层面来分析。首先，我们历来强调改革、发展要结合起来，改革是为了促进发展。因此，要认识这一轮改革的实质，就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改革。而当今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转型。本质上来看，所有改革都是围绕转型这一命题展开的。

其次，这一轮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，同时也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，就是怎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。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，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，依靠市场的作用来推动经济增长。这一轮大力度改革的成果，就是在我国塑造了一个基本的市场经济框架。但后来由于过于强调GDP增长，并且将之视为政绩的重要指标，导致一些地方政府逐步取代了市场的作用，政府成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。政府替代了企业、市场这些元素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，这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因此新一轮深化改革，就是要重新释放市场、企业和老百姓的活力，让他们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这主要是针对企业、老百姓而言，给他们更多积极性、更大发展空间。深化改革的根本指向，就是激发社会活力。

再次，这一轮改革的具体抓手，就是要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行为边界。比如对政府来说是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，而对企业等市场主体来说，则是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。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市场行为，都需要通过改革来找到自己的行为边界。举例来说，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的负面清单制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举措。负面清单明确了对政府的授权，是我国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制度创新。给各种主体的行为合理性划定边界，目前各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一思路来分别展开的。

市场经济的一大标志就是资源得到优化配置，这主要取决于政府、市场的行为是否合理。而这一轮深化改革的目标就着眼于此，方向、思路都是非常明确的。相比于过去“摸着石头过河”式的改革，这一轮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更加清晰。（2014年7月22日《广州日报》谢鲁江）

◆文　坛

民谣里的宋朝

历朝历代，因为政有善恶之别，人有美丑之分，而百姓诉求又得不到及时处理和疏导，便滋生了大量民谣。《诗经》中的《硕鼠》就是最古老、最流行、最经典的民谣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！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。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爱得我所……”一个时代的民谣，如同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，能清晰地映照出许多比正史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。例如，从宋朝众多民谣中，随手拈出几首，当时的政情与社情，时弊与民怨，甚至一些官场趣事与宫廷秘闻，均跃然纸上，一目了然。

对好官的盼望，是帝制时代百姓的共同心声。宋仁宗康定年间（1040—1041年），西夏扰边，战火燃起，韩琦、范仲淹先后受命，领军御边。他们采取修固边城、精练士卒、招抚属羌、孤立西夏的办法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百姓欢欣鼓舞。故民谣曰：“军中有一韩（韩琦），西贼闻之心骨寒；军中有一范（范仲淹）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

宋仁宗一朝，包拯以立朝刚毅、铁面无私而闻名遐迩，因他曾任天章阁待制，百姓亲切地称他为“包待制”。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包拯权知开封府，负责京城诉讼和治安。当时，打官司有一个规矩，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门递交状子，要由小吏转呈。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，许多人不得不上下打点，疏通关节，一个官司打下来，往往赢了官司，输了铜板，得不偿失。包拯坐堂开封府，却一改陋习，大开正门，使百姓能够直接上前陈述曲直，诉说冤情，既减少了百姓的打点费用，又准确地把握了案情，更缩短了审理周期，一举数得。因此，京城迅速流传这样一首民谣：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”意思是打官司无钱疏通关节也没关系，有包大人呢！

好官少，酷吏多，是帝制时代的通病。而那些通过投机取巧上台的权臣，更是巧立名目，盘剥百姓，苛政猛如虎。百姓诉求无门，只好编段子、传民谣，诅咒贪官污吏，图个嘴巴快活。宋徽宗在位期间，童贯、蔡京通过“花石纲之役”，帮助皇帝搜罗天下珍奇，深得宋徽宗信赖。他们结党营私，打击异己，祸国殃民。于是，便有了民谣：“打破筒，泼了菜，便是人间好世界。”“筒”指童贯，“菜”即蔡京，表达了百姓对奸臣和恶政的深恶痛绝。当时，朝廷不但横征暴敛，而且卖官鬻爵。有一首民谣就直指这种丑恶现象：“三千索，直秘阁。五百贯，擢通判。”（宋代一千文铜钱为一索，或一贯，大致相当于一两银子）意思是三千两银子可买一个秘阁官员，五百两可买一个地方通判，买官卖官都已经明码标价了，可见当时官场风气堕落的程度。

靖康初年（1126年），金国屡屡举兵南下，宋军常吃败仗，每当此时，皇帝便纷纷下诏，征求应变之策，做出广开言路的开放姿态。而一旦金兵稍退，皇帝便又莺歌燕舞，纸醉金迷，听不进任何意见了。《宣和遗事》记载说：“城门闭，言路开。城门开，言路闭。”城门闭喻战事紧，城门开喻战事缓，讽刺了统治者的急功近利和反复。

还有些民谣甚至操心皇帝家事。淳熙十六年（1189年），宋孝宗让位于儿子宋光宗，自己当上了太上皇，希望过几年舒心日子。然而，宋光宗坐上皇位后却一反常态，对深居重华宫的孝宗不但没有正常的礼节，甚至一年多时间，不去探望孝宗。作为天下表率的皇帝，竟然在一贯标榜以孝治国的国度里，不忠不孝，结果道路流布，家丑外扬。因此，民谣说：“汝亦不来我家，我亦不来汝家。”

不过，民谣更多的是指向社会不公和正义缺失。帝制时代，作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既无地位，收入也微薄，万一遇上灾年，常常农田绝收，饿殍遍野。但即便如此，统治者却依然觥筹交错，过着花天酒地的奢靡生活。《水浒传》中的北宋民谣：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禾田垅亩半枯焦；农夫心内如汤煮，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反映了百姓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极度愤慨。（2014年7月9日《羊城晚报》晏建怀）

◆史海钩沉

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

雍正上任后，既不容忍“贪”，又不容忍“懒”，两手抓，两手硬。他首先诛杀贪官，保持高压，让官员们听到“钱”字就发抖。与此同时，雍正奖掖勤能、责罚庸懒，逼迫官员改变作风，不换脑筋就换人。于是，各级官员很快适应了新形势，纷纷行动起来。官场风气迅速扭转，号称“雍正一朝，无官不清”，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，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。

考核县太爷

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，是清朝官场例行公事，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。1724年又是考核年，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，对一个县官的处理不同以往，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。

此人名叫常三乐，直隶吴桥县令，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。

通过认真听取下属意见，查阅文书档案，走访地方士绅，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评语：一是“操守廉洁”，是个清官；二是“懦弱不振”，工作打不开局面。他据此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，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，工作量却不大，对他比较适宜。

吏部看了考核报告，向李维钧提出一个问题：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，有什么具体表现，给吴桥县造成了什么严重损失？

尽管常三乐工作吃力，但是钱粮该收也收了，社会治安也说得过去，也没发生过什么群体性事件，还真挑不出大毛病来。

吏部说，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，把人家调离重要岗位，理由不充分，也不符合惯例，提醒提醒算了。

李维钧坚持自己的看法。吏部自信地说，咱也别争了，还是请示皇上吧。

雍正看了报告，朱笔一挥：撤职！理由很简单，县域是社稷基石，县令责任重大，常三乐没有责任心，本身就是失职渎职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？

其实常三乐真该偷着乐。山东曹县盗贼猖獗，社会治安很成问题，老百姓直叫苦。县令王锡玠不敢抓不敢管，结果被摘掉乌纱，还判了5年徒刑。正二品的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，为人老实本分，但作风拖拉，工作长期没起色，雍正勒令其马上退休回家。

康熙朝末期那些年，官员们实在是太爽了，就像晚清的李鸿章说的那样，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，那就是太笨了！那时，皇上的脑血栓比较重，对人对事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常说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，官场的贪、懒蔚然成风，通不过考核的很少，被严肃处理的更少。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往往罚俸了事，官员经济上吃点亏，政治前途一点不受影响。

眼看雍正帝的治吏新政如此严厉，各级官员在震惊之余，终于回过味来：看来，官是不好当了！不但要两手干净，这双手还必须干活呢。

但是，有的人思想一时转不过来。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：为报答皇上厚爱，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，两袖清风。雍正不以为然，批示道：要求太低了吧！当官本来就不该贪，这算什么高标准？如果只满足于“清官”的好名声，却倒了油瓶不扶，不就是绣花枕头吗？

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，否则一切免谈。贪能误国，懒也误国，无所作为的“清官”就是庸官，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，都不是好官。作风上正派廉洁，工作上敢于担当，二者缺一不可。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。

改变观念谈何容易。无官不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，所以有一种非理性的官员评价标准：只要不贪腐就是“好官”，至于这“好官”为国为民有啥贡献，倒没人在意，可谓“一白遮百丑”。为了纠偏，雍正不能不创新工作方法。

提拔工勤员

1728年（雍正六年）元宵夜，内阁工作人员小蓝正在顶班，忽然进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，应该是出来散步的内廷值班员。两人一见如故，边喝茶边侃大山。

高个子问，你是什么官？小蓝不好意思地说，不是官，小小工勤员，收收发发，给领导沏沏茶。高个子问：其他人呢？小蓝回答，都回家看灯去了。高个子很好奇：你不喜欢看灯吗？小蓝说，当今皇上励精图治，听说晚上都不睡觉，万一有个急件，没人跑腿可要误大事！

高个子点点头，又问小蓝将来有什么打算。小蓝说，假如天上掉馅饼，能到船舶管理所工作就好了。我家孩子多，这样就是闹饥荒也饿不死。高个子哈哈一笑，告辞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雍正就问：哪个船舶管理所有空缺？下面说广州有。雍正说，让内阁的小蓝去吧。大家正在惊讶中，雍正又让人告诉小蓝，要吃鱼自己下水捞，不能讨渔民便宜。

只要正派能干，雍正都会重用，哪怕有不同看法。

田文镜主政河南、山东的时候，配合雍正新政，狠狠打击贪官污吏，大力整顿官场作风，就连皇亲国戚到地方收了礼，他也敢向皇上报告，得罪了不少人。雍正把他树为模范总督，号召朝中大臣向他学习。

户部向各省要钱扩充小金库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只是没人敢点破。户部一个叫李卫的小臣，曾多次向户部大臣提意见，人家就是不理。李卫就弄来一只柜子，写上“尚书专用钱柜”字样，放在衙门口羞辱尚书。当时雍正还是雍亲王，他记住了李卫的名字。当皇帝后，几乎年年提拔李卫，李卫也不含糊，在哪儿都大刀阔斧工作，政绩斐然。

但是李卫为人粗粗拉拉，比如直呼大臣“老张”“老李”，工作方法也简单粗暴，所以对他的举报就没断过。雍正给大家做思想工作：这个人浑身是刺不假，但都是为了工作。你们要不服气，给我推荐个又能干又温柔的完人吧。

不管大家对雍正的团队有什么意见，但是，他们大多为人清白，勤奋能干有建树，这是公认的。

两个翅膀才能飞

有其臣必有其君，雍正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、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。

雍正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，只有过生日那天才给自己放天假。现存档案表明，他光在奏折上就批了1000多万字，是全部《资治通鉴》字数的3倍多。

雍正的父亲康熙创造了一个盛世神话，最后也留下了一堆问题：吏治腐败、效率低下、国库空虚。早在当藩王时，雍正就深为忧虑。

雍正在任短暂的12年8个月，有一系列大动作：创设军机处，集中权力推进改革；取消人头税，缓解社会矛盾；改土归流，维护国家统一，等等。如果没有肃贪治懒的铺垫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数字最能说明问题。康熙末年，国库存银仅3200多万两，到雍正七年，已增长到6000多万两，几乎翻番。雍正的父亲康熙遗留的烂摊子，儿子乾隆可能会遇到的障碍，在他手中基本收拾停当。华裔日本学者杨启樵感叹：“康熙宽大，乾隆疏阔，要不是雍正的整饬，清朝恐早衰亡。”

时光川流不息。让官员告别“贪”“懒”恶习，插上“廉”“能”双翅，扶摇天地，大有作为，这个雍正成功的秘密，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，仍然在闪着光。（2014年6月13日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习骅）

◆评　论

为“混”而“混”思维要不得

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宣布，在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、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开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。而此前，我国地方国资国企改革“重镇”——上海市推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9条具体措施，并明确用3到5年时间基本完成国企公司制改革。作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，国资国企改革迈出重要一步。

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、保值增值、提高竞争力，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、相互促进、共同发展，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向。加快“混合”，大势所趋。但也要认识到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避免为“混合”而“混合”的倾向。眼下，有个别地方脱离企业发展实际，定时间、定任务、定工作量，规定条件成熟的要“混”，条件不成熟的也要先“混”了再说，颇有“大跃进”之嫌。

为“混”而“混”思维要不得。混合所有制不是所有制的简单拼凑，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创新，需要理念、思路等方面的融合，既要“蹄疾”也要“步稳”，既要有“名”更要有“实”。如果为“混合”而“混合”，认为“一混就灵”，不管企业是否具备“混”的条件，也不管引入的资本是否能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，把“混合”等同于“大功告成”，势必会把改革引入歧途。

当前，进一步把“混合”推进下去，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。比如，发展混合所有制首先要让国企和民企双方都有“混”的意愿和动力。但从现实情况看，大多数国企在改制中都要求绝对控股，一些处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国企还存有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想法，也有部分企业只愿拿出不赚钱的业务“甩包袱”。民企也有自己的“小九九”，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存有不让控股就不“混”的思想；还有不少担心混合后没有话语权，权益得不到保障。又如，我国相当多国企的“一、二把手”都是行政任命的，这与混合所有制企业更多按市场规则选聘经营者的“行规”相冲突，现有国企管理制度和方式面临重大改革。再如，民营资本投资能力与巨量国有资本的匹配问题。虽然这些年民营企业发展较快，但单个民企的规模还相对较小。有些大的央企，拿出其中一小部分业务，就价值上千亿，单个民企缺少参与进来的家底和实力。此外，企业员工如何持股，分歧也较大。员工持股作为一种长效激励机制是调动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手段，但棘手问题是谁来持股。全员职工持股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讨论并试点过，成效不大。今后是否再试一次？少数管理层或技术骨干持股，容易引发员工不满和国有资产流失。如何摆平这个问题，必须要有缜密方案。

可见，让混合所有制“落地生根”，是一个系统工程，需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，取得好的经验办法加以推广，真正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在“混合”中产生“化学反应”，实现“1+1＞2”。

总之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。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深化国企改革，必须遵循这条规律，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、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，充分发挥市场在“混合”中的应有作用。在具体运作过程中，既要积极推进相关改革，同时也不能操之过急搞“拉郎配”，要成熟一个推进一个，勇于让企业在“混合”中担任更重要角色，敢于让市场去“试错”。（2014年7月21日《经济日报》马志刚）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　邮政编码：100091　总编辑：钟国兴　社长：王金龙　广告部电话：62805980 62806380　发行部电话：62806227兼传真　总编室电话：62805368 62806234　电子信箱：xuexishibao@126.com
定价：全年180元　邮发代号：1—267　国外发行代号：W3970　开户银行：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　户名：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　账号：2613000456　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　承印：人民日报社印刷厂